

兴安文丛

18

国家文学 辛制与回应

庄华兴
◎ 著

雪隆兴安会馆

大将出版社联合出版

云里风主编

兴安文丛（第三辑） 18

国家文学

宰制与回应

National Literature: Hegemony and Response

庄华兴 编著译

雪隆兴安会馆

大将出版社

联合出版

大将出版品第248种

兴安文丛（第三辑）18

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

National Literature: Hegemony and Response

编著译：庄华兴

文丛主编：云里风

主 编：徐婉君

助 编：黄宇琛

校 对：庄华兴

社 长：傅承得

发 行人：傅兴汉

创意顾问：游 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律师、王瑞隆律师

联合出版：雪隆兴安会馆

PERSATUAN SHING AN SELANGOR DAN WILAYAH PERSEKUTUAN

No. 13 & 15, Jalan Thambapillai, Brickfields,

50470 K. L., Malaysia.

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发 行：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21-A, Jalan SG 8/7, Taman Sri Gombak,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 E., Malaysia.

Tel: 03-61883266 Fax: 03-61885266

E-mail: mentorp@streamyx.com

Website: www.mentor.com.my

印 刷：佳印贸易公司

第1版第1刷：2006年5月15日

定 价：RM 18.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3098-73-8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Chong, Fah Hing, 1962-

[Guo jia wen xue: zai zhi yu hui ying]

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National literature: hegemony and response / 庄华兴编著译

（兴安文丛：18）

ISBN 983-3098-73-8

1. Ethnicity in literature. 2. Ethnic relations in literature--

3. Literature and society--Malaysia. 4. Malaysia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criticism . I. Title. II. Title:National literature:

hegemony and response. III. Series.

895.1852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总序

◎云里风

为了推展马华文学活动，协助马华作家出版著作，本会于2003年开始设立文学基金，出版“兴安文丛”。在热心乡贤的赞助和编委会同人的通力合作下，第1辑及第2辑已分别于2004年及2005年顺利出版，现在第3辑的征稿工作亦已完成，共收到申请的作品十八部，计小说三部、散文十一部、诗歌三部，评论一部，经评委会慎重评审后，录取了其中的六部：廖宏强和萧丽芬的小说、鱼简和苏清强的散文、庄华兴的评论和邢诒旺的诗歌，仍交给大将出版社负责印行，定期在今年五月间出版。

马华文学界有两项盛大的壮举，一项是由十多个华团联办的“马华文学节”，另一项是由星洲日报主办的“花踪文学奖”。这两项活动的确在马华文学界掀起了层层巨浪，但美中不足的是每两年才举办一次，往往是巨浪过后，又恢复了波平如镜的宁静。本会所举办的“兴安文丛”、“兴安文学营”及“孝亲敬老”征文赛，却是常年活动，每年皆如期举行，而且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也许没有在马华文学界掀起滔天巨浪，至少在波平如镜的马华文坛荡漾起阵阵涟漪，收到了加暖保温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1月3日所举办的第二届“兴安文学营”，参加之学员竟然超过一百五十名，这的确是一件聊以告慰的事。



本人于2002年起担任雪隆兴安会馆会长后，对推展会务及文教活动，战战兢兢，不遗余力，深虞有所陨越，幸赖全体理事同心协力及热心乡亲鼎力支持，各项活动均能顺利进行。根据本会章程规定，会长任期是每届两年，最多两届，今年5月换届改选，我即将引退让贤，深信新届理事会能秉承兴安人的优良传统，积极发扬文献名邦的精神，把上述三项文学活动，继续举办下去，不要中断。

在此，我要再一次向热心赞助出版经费的乡贤表达崇高的敬意，也要向所有的申请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大家的踊跃申请，说明了他们对“兴安文丛”的重视和支持。不过，由于文丛每辑只限录取六部，粥少僧多，许多高水准的优秀作品也只好被割爱。我除了对此表示歉意外，也希望他们不要灰心，只要“兴安文丛”今后每年继续出版，凡是优秀的作品必然会有被录取的机会。

2006年1月10日，于吉隆坡



第一辑总序

◎云里风

雪隆兴安会馆是一个乡会组织，其祖籍地兴安又名兴化，地处福建闽中，包括莆田和仙游两县，现在合称为莆田市，自古以来，享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历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如中国著名的史学家郑樵、文学家刘克庄、理学家林光朝和书法家蔡襄，都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杰出人物。在科举时代，先后出了十多位状元，两千多名进士，也有好几位宰相。远者姑且不说，近代兴安人在各领域也有优越的成就，中国当代科学院及工程院的院士中，有十一位是兴安人，兴安籍的专家教授达六千多名，在文学界尤为特出，著名的散文家郭风老先生、福建省文联主席许怀中、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兼福建省文联副主席陈章武、福建省作协秘书长朱谷忠、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这几位福建省文学界的最高领导都是兴安人。近几年来，兴安籍的作家已由原先的三十多名增加到两百多名，他们在文学的园地里努力耕耘，创作了不少在全国比赛中获奖的优秀作品，充分地表现出“文献名邦好儿女”的才华。

马来西亚的兴安人虽然不多，但也不会很少，全国有三十三三个兴安同乡会，平素继承“文献名邦”的优良传统，各自展开多采多姿的活动。雪隆兴安会馆位于我国首都，人文荟萃，创办以来，已六十九载，目前拥有会员一千八

百多名，规模之大，在我国兴安乡会中允称第一，历届理事们精诚合作，会员同乡们鼎力支持，会务因而蒸蒸日上。本人忝为兴安的一份子，前年5月蒙同乡们厚爱，当选为主席之职，上任之后，即拟订发展大计，希望能通过各种文教活动，把“文献名邦”的精神发扬光大，举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几项：

（一）举办“孝亲敬老征文赛”——这是本会常年重点活动，由本会名誉会长庄玉霖局绅赞助经费，目的在于鼓励兴安同乡及马华作家努力创作，并藉此推展“孝亲敬老”活动，此项征文赛获得写作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反应良好。

（二）设立“兴安图书馆”——为了培养同乡的阅读风气，本会在去年初设立了“兴安图书馆”，6月间恭请我国财政部副部长拿督黄燕燕乡贤主持开幕。此图书馆拥有藏书一万两千余册，采用电脑系统管理，深获文教界人士之赞赏。

（三）出版“兴安文丛”——为了协助马华作家出版著作，以促进马华文学的发展，本会决定由今年起出版“兴安文丛”，预计每年出版一辑。

窃维乡会之设，除联络乡谊外，必须发挥组织的功能，积极举办各种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动，以嘉惠会员，造福社会，尤其是文化活动，更应重视。语云：“文化乃民族之灵魂，而文学系文化的精华。”本人有鉴于此，早在十年前担任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席时，即开始为该会主编“马华文学丛书”，先后出版了五辑，共五十八部，为马华文学界竖下了一个鲜明的里程碑，也为我兴安同乡会赢得了不少掌声。

2001年本人引退让贤，此文丛因经费问题而告中断，深为可惜。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就任雪隆兴安会馆主席后，曾下定决心，要使“马华文丛”复活，于是采取移花接木之计，把原先在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出版的工作，移到雪隆兴安会馆来，并定名为“兴安文丛”，交由大将出版社出版。

在此我要向热心赞助出版经费之乡贤致由衷的谢意，更要感谢大将出版社的合作，愿意接受文丛的出版和发行。深望“兴安文丛”能引起马华作家们的重视和支持，俾今后每年顺利地出版下去，以期为马华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2004年1月10日



代自序：国家文学体制与 马华文学主体建构

后殖民情境下的马华文学

今日社会已经迈入后工业时代（post-industrial era），随之而来的是科技高度的分工与专业化。在经济层面，人口的跨国流动（transnational movement）配合全球化趋势大幅度提升，形成多元的价值体系与认同，更重要的是国家疆界与国籍意识的淡化。这些都对现代民族—国家之体制产生强烈的冲击，譬如在国家范畴内各族群的情感联系、对语言与文化一体化的态度等等。相应的，人们对民族—国家的基础——民族主义的贡献也开始产生怀疑。然而，给予它肯定并提出修正者也不少。在西方学界，Hobsbawn（1990）和Arjun Appadurai（1996）可视为前者的代言人，而Anthony D. Smith（1991）、David Miller（1988）则代表后者无疑。就文学/文化领域而言，我们今天既然不得不面对国家文学这个议题，就不得不思考它在当下情境的切当性？如果国家文学是一个“必要的恶”，则它的必要性在哪里？它还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新的认知？它和国内各语种文学的关系，尤其是我们所关心的马华文学——建立了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否非常重要？抑或可以置之不理？

这就不得不从晚近马来文化、学术与思想界对马来文学

的批评说起。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是文学界？这是否说明马来作家已丧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省能力？就当前马来学术与思想界的批评，我们得知马来作家的思辨能力与思想水平的确出了一些问题。儒斯丹·沙尼（Rustam A. Sani）在回应雅赫雅·伊斯迈（Yahaya Ismail）对马来文学的强烈批评时，指出当前马来文学界过度热衷追求“声色”活动（berpesta-pestaan），对思辨性活动兴趣不大，难免出现前者所谓的廉价思想现象（fenomena pemikiran lambak），是整体马来知识界思辨危机情境下的一个缩影。究其原因，他认为这是功用教育的恶果。（1993:81-87）鉴于此，我们很难从马来作家圈中获得有用的回馈，更甬说借以反思现有的国家文学概念。虽然马来写作界曾出现一些异声，如赛夫·纳兹里·瓦希德（Shaiful Naszri Wahid 1999）和沙列·宾·佐涅（Saleh Ben Joned 1994），但基于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马来作家，故其言论没有太大的代表性。¹

众所周知，民族主义向来是本邦马来族群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命题。它真正始于上世纪30年代，其时英殖民主义者已经在马来亚建立起稳固的政权，相应的，完善的行政/文官体制也建立起来了。1920年代开始施行的中央行政制（centralization policy）显示殖民政府意图在各马来土邦推行统一政体，由吉隆坡统筹政权，并给予白人和华人商贾参与议事的权利（Rustam A. Sani 2004:15）。这引起了马来统治阶层的不安与不满，遂有1930年代的去中央行政制（decentralization policy）。此时，外来移民臻达有史以来最高峰，进

一步加剧了马来人对移民的敌意与反抗。²1932年《议会》的社论便明显质疑外来移民自认为马来亚子民的合法性：

我们不否认马来亚人（或任何其他称谓）是大部分居于此，并开发本邦的人，然而，我们无法承认他们也是对此地拥有主权的子民。（引自Rustam A. Sani 2004:23）

这说明关键不在华人对斯土够不够忠贞，而是谁先占有这片土地，并自命为邦国之子（anak negeri）。这个观念在马来民族主义支配之下，到了后五一三时代逐步与“土地之子”（bumiputera）的理念结合，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³相应地也抵销了他者对家国表示效忠/忠贞之动作的合法性。

究其实，此乃关涉各造对建构国家观的认知落差上。显然，华人的国家观是单纯而分明的：政治上只要效忠于本土即可，文化认同可以不必与政治认同混为一谈。然而，马来民族并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他们强调马六甲王朝的历史延续性，强调马来政体（Malay polity）的合理性，强调马来民族主义以及区域本质与伊斯兰传统，并企图抹除马六甲王朝以前的马来—印度化时期的记忆。此或许可以解释何以马来亚从战后至今的历史进程如此曲折。间中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发挥很大的作用，它不仅改变了群岛马来民族的历史航道，更把华族推向历史前沿，让它直接参与历史的形塑。战后至1960年代中晚期的左翼斗争便是最佳的例子。因此，今天我们处理国家文学以及各族群文学之间的互动等问题基本上无法不考虑这样一个历史元架构。即如何面对那继承自殖

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以及它如何内化于文化霸权的结构上。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马来亚华人居于血缘关系，不仅全力支援中国抗战，亦体现为高度的仇日与爱国情绪，中国民族主义因而得以迅速播迁海外，或普遍上被称为“南洋大后方”，尔后反过来支援祖源地的革命事业，无形中加深了马来人对华人的戒心。这些在二战前后的马来小说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⁴

至战后初期，马来民族主义运动首先由左倾组织主导，最初是马来青年会（Kesatuan Melayu Muda），后来出现了马来亚马来民族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这些党团的斗争企图以群岛马来文化为整合指标，争取在区域内建立一个“大马来国”（Melayu Raya）。这个以同源文化为号召的马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引起英荷殖民政府的关注，英政府遂借扑灭马共“骚乱”为由，于1948年颁布紧急法令，打压各民族抵抗力量。从1948至1969年之间，大马来民族主义先后受殖民政府和右翼巫人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巫统）打压，但未曾消隐。它转而透过各种文学与文化组织延续其斗争。五0世代（Angkatan Sasterawan 50，简称ASAS 50）同人的大马来国或大印尼思想与精神意识便是这个脉络的具体例子。后五一三时代，当局借新经济政策成功塑造马来中产阶级，奉行的却是土著主义（bumiputeraism）（Rustam A. Sani 2004:11）。对某些左倾——大马来民族主义者而言，它虽被视为挫败的民族主义，但从历史演变，我们了解到：近70年来，民族主义始终是马

来文化界的思想底蕴与工作指导原则，更是一个远程目标。在跨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马来民族主义思想不但没有消隐的迹象，反而欲借由它促成马来民族—国家，并企图把殖民地时代追求的大马来民族主义转化，进而把它提升至马来西亚国族主义（*nasionalisme Malaysia*）的位置。明显的，这是一个统摄力更强、权力意志更大的政治理念。早在1970年代，大马来—印尼主义学者/文化人伊斯迈·胡辛就提出新国家主义或新国族主义（*nasionalisme baru*）概念（与Jaafar Husin访谈：1979:26），儒思丹则对工业化之民族—国家（*industrial nation-state*）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表示乐观，并充满期待（2004:59）。阿都·拉曼·恩蓬也不厌其详地为马来民族主义朝马来西亚国族主义转向辩护以及国家文学在促成马来西亚国族发挥的作用（2001:51-60）。这批马来知识精英部分或居于权力核心以外，或居边缘位置⁵，但无可讳言，他们的言论对文化决策者却发挥某种程度的作用。我们在讨论国家文学议题不可忽略这个维度。

马华文教界一直以来对马来民族主义的发展忧戚于心。文学界常因马华作品不被纳入国家文学范畴而提出讨论。从方北方、陈应德、林建国、张锦忠到晚近庄华兴与黄锦树，无论立场如何，都明显揭示了马华文学界的国家文学情结。对国家文学强烈的反话语（*anti-thesis*）行为更彰显了论者从失落到追寻的循环往复的焦虑感与两极紧张。马华文学从战前至建国独立初期所表征的离散精神与经验结构在后五一三时代已逐步发生质的变化。我们观察到，马华文化/文学

在有意识地介入国家话语体系之际，却又未完全褪尽中国因素。就在不断介入一回返、游离一挺进的姿态当中，马华文化/文学的主体性逐步清晰起来。马华中生代作家，如梁放、小黑、傅承得、游川、方昂、陈强华的作品体现的正是这样的经验/意识转折，象征着马华文学对国家文学话语的介入⁶，而这样的新书写意识与经验结构恰恰是在民族意识与公民意识之间取得平衡之后的结果。具体的方式是透过现代主义艺术突入创作禁区而取得家国叙事的话语权，同时也回应了同时期马来—国家主义文学的书写策略。诚如山东大学黄万华先生的观察，后五一三时代的马华作家成功借着现代主义“在虚实、内外交割中突入现实禁区，它在夸张、幻化中深化本土意识，它在质疑、颠覆中开始呈现一种突破南洋族群情结的视野拘囿的新生命力……尽管东南亚华族仍遭受着现实不平等待遇，族群间的沟通仍有着艰难的跋涉，但直面而又超越种族对峙的文学进程已经开始……”（2004:111）可见，这样一个全新的经验结构开始与家国（请注意：不是国家）命运联系得更紧密了。就这一点，个人以为，所谓文学的跨国流动/流寓论纯粹是一种伪装姿态，内在精神的复返才是真灵魂。⁷惟有通过这样的理解，我们才不处处受制于理论而忽略马华文学踏出的每一个艰难的脚步，或者被卷入国际学术流派角力的漩涡中而摧折了马华文学的成长。

作为马来西亚文学之一分子，马华文学在学理上不必然和国家文学以及它所涵盖的爱国主义思想发生冲突。必须清楚的认识，并坚持：马来西亚任何语种文学都是国家文学的

一环。这在涵盖整体理论与行动架构中只能算是初步的工作。鉴于此，我们首先必须扫除的障碍是：如何给予国家文学更开放的诠释，俾使它具备更周延的意义与包容的内涵。就目前所见，有关国家文学的诠释仍然停留在单元马来主义的认知或从属意识结构上。在这关键，语言已然被高度政治化，因而不免被赋予封闭、偏狭、防卫性（defensive）、机动反应（re-active）、侵略性（aggressive）等性格，这些都从它对异质思想与符号系统的态度看出来。⁸这更印证了儒思丹·沙尼所谓的马来文学缺乏思辨内涵（ketandusan isian intelektual；1993:62）或阿都·拉曼·恩蓬所谓的批判文化（budaya wacana kritis；2001:118）。伊斯迈·胡辛（1988:60）坦承目前马来西亚的马来语文仍不足以支撑独立自主的人文学术生命，因而必须倚赖与印尼的合作关系。显然，这是一个大马来民族主义的问题，却深刻主导马来西亚的文化建制。之前所提到的政治性语言风格，不仅出现在以国家文学正身自居的马来文学，相应的在马华文学之中也有迹可寻。譬如在中国情结之下对异族文化与宗教的排斥、反感与恐惧。（林春美2002:332-335）这对一个文学系统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亦似乎宁愿永远屈从于离散与流寓宿命。笔者提出开放的国家文学系统的诉求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透过对国家文学的审视重新思考各族群文学在国家文学之元系统中的定位以及它和国家文学的关系。马来民族的国家观与历史观即已如此，族群政治游戏玩了数十年依然有其号召力。就整个大环境，国家文学和国族议题一样，

不是理论上成立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导正的问题。约言之，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巩固与贯彻一个“多语—国家文学”（multi-languages-national literature），而非“单语—国家文学”（mono-lingual national literature）或“单一民族—国家文学”（literature of single nation-state）。近现代马来亚因殖民主义的介入，的确改变了它的历史航道。然而，这也是确切的历史事实，我们不容许任何族群以本位主义或原生主义（nativism）对历史提出诘难，否则，它便是对历史刻意的否定与嘲（操）弄。殷鉴不远，目前我们已经看到极力为主导性国家文学理念辩护的虚无主义政治（politik nihilisme）指控者（如阿都·拉曼·恩蓬）如何演练虚伪（参氏著2001）。马来学界对马来—印度化时期的历史记忆回避在前，又对殖民主义历史促成现代马来亚的事实否定在后，这种追求干净马来人（Melayu bersih）的偏执史观不仅不符马来西亚当下的现实情境，也直接否定马来西亚华人及其社会与人文建制的存在合理性。在文学领域，国家文学话语架构下的位置就已经为马华文学预设了它的前途与命运。相对于马来—伊斯兰文化，马华文化只是一个小传统（S. Husin Ali 1997）；相对于马来语，华语是封闭、僵化的语言（伊斯迈·胡辛语，见于Anwar Ridhwan ed. 1981）；相对于马来文学，马华文学受囿于中国文学的美学经验与成规（同前），因而并不具备成为国家文学的合法性（legitimacy）。马华文学只能位居族群文学（ethnic literature）。这种情况说明马华文学以及其他非马来语文学仅仅是国家文学语境下的他者。显然，这是